

高阳◎著

这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。高阳对历代皇朝兴废得失的根源，一直有独到的研究，对清代历史及清朝皇帝的行谊，尤其有深入而精辟的见解。而文笔之优美，论述之周密，更是精彩绝伦。

清朝的 皇帝



四
走向式微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高阳◎著

清朝的 皇帝

四

走向式微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朝的皇帝. 4/高阳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5321-4914-8

I. ①清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4340 号

©风云时代出版公司

* 本书由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授权,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特约策划:蔡 耘
责任编辑:夏 宁
封面设计:高静芳

清朝的皇帝. 4

高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6.25 字数 191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14-8/I·3848 定价:32.00 元

目录



文宗——咸丰皇帝

1

穆宗——同治皇帝

59

文宗——咸丰皇帝





清朝的皇帝(四)

文宗名奕訢，宣宗第三子；二兄皆早夭，所以文宗居长，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，即位时未满二十岁。相传宣宗最钟爱者为皇六子奕訢，其得位得力于师傅杜受田。如谓世宗继统出于豪夺，则文宗得位可谓之巧取。《春冰室野乘》记其始末云：

一内务府老司官旗人某君，年七十余矣，通籍道光末，历事四朝，内廷故事嫫熟；尝为述道咸间遗事，多人间所不得知者。云宣庙晚年，最钟爱恭忠亲王，欲以大业付之，金石絨名时，几书恭王名者数矣，以文宗贤且居长，故逡巡未决。滨州时在上书房行走，适授文宗读，微窥上意所在，欲拥戴文宗，以建非常之勋，一日上命诸皇子校猎南苑。

故事皇子方读书者，奉命外出，临行时必诣师傅处请假，所以尊师也。是日文宗至上书房，左右适无人，惟滨州一人独坐斋中，文宗入，行礼毕，皇子见师傅皆长揖，问将何往，以奉命校猎对，滨州乃耳语曰：“阿哥至围场中，但坐观他人驰射，万勿发一枪一矢，并当约束

从人，不得捕一生物。复命时，上若问及，但对以时方春和，鸟兽孕育，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；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，与诸弟竞争也。阿哥第以此对，必能上契圣心。此一生荣枯关头，当切记勿忽也。”文宗既至围所，如所嘱行之。

是日恭王所得禽兽最多，方顾盼自喜，见文宗默坐，从者悉垂手侍立，怪之问其故。文宗曰：“吾无他，但今日适不快，弗敢驰逐耳。”日暮归，复命，文宗独无所献；上询之，具如滨州所教以对。上大喜曰：“是真有君人之度矣。”立储之议遂决。

按：杜受田字锡山，山东滨州人，前任礼部侍郎杜堉之子，道光三年会元。两子一名杜翻，一名杜翰，亦均为翰林。

前引记载，绝对可信，证据是文宗接位，首沛恩施即及杜家。如《东华录》道光三十年二三月间所载：

二月己卯(十六)赏工部尚书杜受田太子太傅衔。其父前任礼部侍郎堉，御书匾额曰：“达尊锡类”。

二月丁亥(廿四)以詹事府詹事杜翻为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衔。

三月庚子(初八)以工部尚书杜受田兼署吏部尚书。

同时以杜受田为中心，组织“班底”，准备从穆彰阿手上接收军机。在赏杜受田官衔的同时，以蔡念慈、冯培元、何彤云在南书房行走。蔡、冯皆杭州人，蔡为道光二十一年会元；而杜受田为是科会试总裁，蔡为其得意门生。冯为道光二十四年探花，与杜翰同榜。何彤云云南人，亦为此科翰林。



按：南书房翰林，原为文学侍从之臣，但亦可撰拟制诰，发生军机大臣或章京的作用。文宗以与杜家父子有关系的人安置在南书房，显有不必要经由穆彰阿而亦可发号施令的用意在内。

政局的变动始于是年夏天，首先是“穆门十子”之首的陈孚恩，于五月间告终养，开去军机大臣刑部尚书的差缺；杜受田调刑部，不久升协办，孙瑞珍由礼部调工部，旋调户部，孙瑞珍为杜受田的同年。到了十月里，穆彰阿终于垮了，特颁朱谕，昭示罪状：

任贤去邪，诚人臣之首务也。任贤不断，则任贤不专。方今天下因循废堕，可谓极矣！吏治日坏，人心日浇，是朕之过；然献替可否，匡朕不逮，则二三大臣之职也。穆彰阿身任大学士，受累朝知遇之恩，不思其难其慎，同德同心，乃保位贪荣，妨贤病国；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；伪学伪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

从前夷务之兴，穆彰阿倾排异己，深堪痛恨，如达洪阿、姚莹之尽忠尽力，有碍于己，必欲陷之；耆英之无耻丧良，同恶相济，尽力全之。似此固宠窃权者，不可枚举，我皇考大公至正，惟知以诚心待人；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，则必立法重典，断不姑容。

穆彰阿恃恩益纵，始终不悛，自本年正月，朕亲政之初，遇事模棱，缄口不言；迨数月后，则渐施其伎俩，如英船至天津，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，以遂其谋，欲使天下群黎，复遭荼毒，其心阴险，实不可问！潘世恩等保林则徐，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，不堪录用；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，剿办土匪，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？伪言荧惑，使朕不知外事，其罪实在于此。

此谕无异宣宗的“罪己诏”，所谓“吏治日坏、人心日浇，是朕之过”，在文宗接位不足十月，何咎可任？自然是先朝三十年之过。所谓“我皇考大公至正”云云，明明道出宣宗不能“早烛其奸”。

当然，文宗决无非薄其父之意，只是谴责不重，不足以去三朝老臣，历数前非，则不能不提先朝，措词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接下来是痛责耆英：

耆英之自外生长，畏葸无能，殊堪诧异。伊前在广东时，惟抑民以奉外，罔顾国家，如“进城”之说，非明验乎？上乖天道，下逆人情，几至变生不可测，赖我皇考洞悉其伪，速令来京，然不即予罢斥，亦必有待也。今年耆英召对时，数言及英人如何可畏；如何必应事周旋？欺朕不知其奸，欲常保禄位，是其丧尽天良，愈辩愈彰，直同狂吠，尤不足惜。

按：耆英为禄康之子，宗室，故首言“自外生长”。所谓“进城”之说者，道光二十七年，英国要求其侨民准入广州城，态度强硬，耆英迫不得已，订二年后入城之约，作为搪塞之计。

至期知此事必起纠纷，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，趁机活动留京，巧为规避。广东由巡抚徐广缙署总督、藩司叶名琛署巡抚，至二十九年春，英国要求践约，果然闹出轩然大波。此为耆英“抑民以奉外”的“明验”。

罪状甚重，处分不至于死，穆彰阿“革职永不叙用”，声明是念他“三朝旧臣，一旦置之重法，朕心实有未忍”。耆英“降为五品顶戴，以六部员外郎候补”。文宗于朱谕中谓：“穆彰阿暗而难知，耆英显而易见”，而据王壬秋日记，耆英实为险人，其后复起，而于英法联军之役，终因玩弄手腕，为



文宗赐令自尽。

穆彰阿虽有四子，而后裔不振，相传同光年间以票友下海的名小生德君如，为穆彰阿的孙子，与程砚秋为英和之后，同为旗人贵族式微后所出的名人。

文宗知人之明胜于其父，但早年信任旗人的观念犹牢不可破，及至赛尚阿、讷尔经额债事，方知旗人不可恃。

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七十九论曰：

清沿故事，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，乾嘉时如阿桂、福康安、勒保、额勒登保等，皆胸有韬略，功在旗常；道光以来，惟长龄平定回疆，差堪继武。其后禧恩之征徭；奕山、奕经之防海，或以骄侈召谤，或以轻率债事。

至洪杨初起，李星沅不胜任，易以赛尚阿，馭将无力，遂致敌不可制。讷尔经额庸懦同之，畿甸震惊，自是朝廷始知其弊。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，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。即有时亲藩遥领，亦居其名，不行其实。盖人才时会使然，固不可与初入关时并论也。

所谓“清沿故事”，是沿明朝大学士督师的故事。赛尚阿咸丰元年大拜，是清朝最后一个专征伐的“中枢阁部”；此后曾国藩、官文、李鸿章、左宗棠以大学士督师，皆为因功升任，与赛尚阿不同。

同时，赛尚阿亦为自国库支领巨额军费的最后一人。清初自康熙用兵三藩开始，军费皆由国库支拨，最初，统帅且不必负后勤方面的责任，朝廷特简大员专办粮台。及至乾隆“十大武功”，嘉庆川楚教匪，道光内忧外患迭起，连年用兵，库藏因而竭蹶，最后一笔二百万两给了赛尚阿，复又赐

高宗诛讷亲的“遏必隆刀”，但赛尚阿兵败，并未授首于“遏必隆刀”下。

太平军之酿成大患，实由上下粉饰，报喜不报忧积渐而成。洪秀全、冯云山于道光十六年即已在广西山区传教，地方大吏如懔于川桂教匪的教训，早为曲突徙薪之计，又何致于有“红羊劫讖”？

孟心史《清代史》记云：

道光之季，两广群盗如毛，广西尤遍地皆匪。洪秀全与杨秀清创保良攻匪会，公然练兵筹饷，招收徒众。官捕之，搜捕之，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，巡抚郑祖琛不能决，释秀全出狱。秀清率众迎归，招集亡命，贵县秦日纲、林凤祥，揭阳海盗罗大纲，衡山洪大全皆来附，阴受部署者至万人。以岁值丁未，应红羊劫讖。丁未为二十七年，后三年始以起事称。

（高阳按：未为羊，丁则南方丙丁火，火色红，故称“红羊”，谐音则为“洪杨”，示“天命有归”。）

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，而广西巡抚郑祖琛入告时，只称“会匪”；且亦无洪秀全的姓名，至道光三十年六月，洪秀全金田起事时犹然。及至纸包不住火，经广西提督向荣催促，方始驰奏，已将成燎原之势。

文宗最初的处置是正确的，以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驰赴广西督剿。林则徐于道光廿五年复起，授陕甘总督，二十七年三月移云贵，所至平乱有功，可惜此番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，印鸾章辑《清鉴》记云：

则徐起用后，历任陕甘及云贵总督，政声卓著。未几以病罢归，及广西事起，复诏起则徐为钦差大臣，驰往督剿。则徐故尝督粤，感



惠着闻，中外想望丰采，既奉诏，力疾出山。

秀全士卒闻则徐至，散亡大半，有谋遁走入海者，而则徐卧舆兼程，日行百余里，从者劝节劳暂息，则徐曰：“二百里冰天雪窖，执戟荷戈未尝言苦，此时反惮劳乎？”仍星驰不止。行次潮州之普宁县，疾甚，卒于广宁行馆，年六十有六。噩耗至京，帝大震悼，赐谥文忠。随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，驰代则徐，以周天爵为广西巡抚。自则徐死，而洪杨之变不可遏抑矣。

文宗知人之明，远过其父，而又信任肃顺，故林则徐如不死，膺专阍之寄，可无虞掣肘，必能畅行其志，洪杨不足为患。林则徐之死，惟有归于气数而已。

现在要谈咸丰朝最有关系的一个人：肃顺。宣宗大渐时，受顾命者为“宗人府宗令载铨、御前大臣载垣、端华、僧格林沁、军机大臣穆彰阿、陈孚恩、赛尚阿、何汝霖、季芝昌、总管内务府的大臣文庆”。载铨为高宗长子永璜的曾孙，袭定郡王，载垣为怡亲王，端华为郑亲王，肃顺为端华之弟。

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宗室肃顺，字雨亭，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，道光中，考封三等辅国将军……文宗即位，擢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，护军统领，銮仪使。以其敢任事，渐向用；咸丰四年，授御前侍卫，迁工部侍郎，历礼部、户部七年，擢左都御史，理藩院尚书，兼都统。时内乱方炽，外患日深。

文宗忧勤，要政多下廷议，肃顺恃恩眷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，相为附和，挤排异己，廷臣咸侧目。

八年调礼部尚书，仍管理藩院事，又调户部。会英法联军犯天

津，起前大学士耆英，随钦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纳往议约，耆英不候旨回京，下狱议罪，拟绞监候；肃顺独具疏，请立予正法。上虽斥其言过当，即赐耆英自尽。

肃顺欲置耆英于死，象征了他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：看不起旗人，待旗人格外苛刻。

肃顺重汉轻满，雅重文士，于湖南人尤为有缘。“湘中五子”之四：王湘绮、李篁仙、邓弥之、保之兄弟，皆在“肃门六子”之列。

韩旋左宗棠之狱，支持胡林翼；保曾国藩，更为卓识伟举；左宗棠于咸丰初年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，凡事专擅，骆秉章拱手受成而已。相传骆秉章一天听辕门发炮，惊问何事，林官答以“左师爷拜折”。向例拜发奏折须鸣炮；骆秉章不知有此事，则是奏稿亦未曾寓目。

因此，左宗棠得了个外号叫“左都御史”；巡抚例挂“右副都御史”衔；左师爷权重于居停，故有此戏称。

咸丰八年冬天，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，以“违例乘舆，私役弁兵”为骆秉章所劾，起因据说是不服左宗棠的调遣；传说还揍了樊燮一个嘴巴。

樊燮走湖广总督官文的门路，为之奏署湖南提督。提督为一省绿营首长，见总督堂参，见巡抚则行宾主礼；樊燮打算藉此抗衡骆秉章，而益触左宗棠之怒，再上弹章，革了樊燮的职以外，并以“有侵亏营饷重情，请提省究办”。

樊燮罢官后，回湖北天门原籍；以左宗棠不过一名举人，而视武职大员如厮养，因延名师教子，责以“不中进士，非我之子”。他的儿子果然不负期望，不但成进士，而且有诗名；此人即樊山老人樊增祥。

这是后话，在当时樊燮的反击，亦颇厉害；薛福成《庸庵笔记》记：



清朝的皇帝(四)

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，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，官文恭公督湖广，复严劾之，廷旨勒下文恭密查，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，可即就地正法。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；心夔告王闿运勿秋；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。郭公固与左公同县，又素佩其经济，倾倒备至，闻之大惊，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。肃顺曰：“必俟内外臣有疏保荐，余方能启齿。”

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，乃浼潘公疏荐文襄，而胡文忠公上“敬举贤才，力图补救”一疏，亦荐文襄才可大用，有“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”之语。上果问肃顺曰：“方今天下多事，左宗棠果长军旅，自当弃瑕录用。”肃顺奏曰：“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，赞画军谋，迭着成效，骆秉章之功，皆其功也。人才难得，自当爱惜。请再密寄官文，录中外保荐各疏，令其察酌情形办理。”从之。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，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，而文襄竟未对簿。俄而曾文正公奏荐，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，勋望遂日隆焉。

按：左郭两家，儿女姻亲，交情素密。后来郭嵩焘任广东巡抚，而左宗棠为筹饷源，欲夺广东地盘，竟奏章严劾郭嵩焘，两人交谊不终，郭嵩焘终身不谅左宗棠。至于潘祖荫，则左宗棠始终敬礼；因荐左疏中，“有天下不能无湖南；湖南不能无宗棠”之语，左视之为知己。

潘好金石，当左西征，开府关中时，有碑石出土，每遣良工精拓，专差赠潘；岁时馈赠不绝。左之待郭与潘，截然相反；此亦英雄行事不可测者之一端。

相传官文劾左，有“一官两印”之语，故上谕中令官文密查，如有不法情事，可就地正法的严厉措施。左宗棠于咸丰九年腊月二十离湘抚幕，赴

湖北对质；樊燮欲得之而甘心；次年三月间，自襄阳寄郭嵩焘函云：

抵襄阳后，毛寄耘观察出示润公密函，言含沙者意犹未慊，网罗四布，足为寒心，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。杞人之忧，曷其有极；侧身天地，四顾苍茫，不独蜀道险巇，马首靡托已也。

帝乡既不可到，而悠悠我里，仍畏寻踪。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，入淦老营暂栖羈羽，求一营官，杀贼自效。幸而克捷，并受其福；否则免胄冲锋，求吾死所。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，固有间耳。

函中“毛寄耘”即毛鸿宾；“润公”指胡林翼；“淦老”指曾国藩。樊燮之于左宗棠，此时已成不解之仇，官司虽了，樊燮寻仇不已，左宗棠既不能赴京，并不敢赴京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迫不得已赴曾国藩大营避祸，不意成就后来一番勋业。

如仍在骆秉章幕中，虽迟早将脱颖而出，但军功保荐，即或扶摇直上，亦必十年以后，方成督抚；但已错过同治建元，克复苏常，收复西浙，直捣“天京”这一场龙腾虎骧的大战役，即或有所作为，不过成一同光间名督抚而已，决不能封侯拜相；更不能与于中兴名臣之列。是则樊燮之造就左宗棠；与左宗棠之造就樊增祥，其事不同，因果则一。

“肃顺推服楚贤”之尤有关系者，为举荐曾国藩。文宗即位后，曾上《敬陈圣德三端》一疏，语过切直，文宗大怒；多亏军机大臣祁隽藻及曾的会试座师季芝昌，极力解释，始得无事；及至洪杨事起，曾国藩奉旨办团练，虽物望有归，而资历尚不足以封疆三省，亦由肃顺之荐，始得继何桂清而督两江。

姚永朴《旧闻随笔》，记咸丰十年四月，曾国藩新命的由来云：



清朝的皇帝(四)

咸丰十年，江南大营再陷，官军悉溃，苏常相继失守，左文襄公闻而叹曰：“天下事其有转机乎？”或问其故，文襄曰：“大营将蹙兵疲，非得此洗荡，何由措手？”又问谁可以善其后？胡文忠曰：“朝廷若以东南事付曾公，天下不足平也”。时物望咸属公，独山莫子偃先生方在京，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不可；而其时得君者为尚书肃顺，适湖口高碧湄，馆其家，遂往商焉。

高白于肃顺，肃顺然之，翌日下直，径至高馆握手曰：“事成矣，何以谢保人？”盖已得俞旨也。肃顺后虽以骄纵败，然此事于大局实无关系云。

高碧湄即高心夔，时为肃顺西席。相传肃顺欲使高中状元，采取很霸道的手段，而终无济于事。

《越縕堂日记》载：

庚申殿试，肃方箠权，张甚，必欲为（高）得状元，询之曰：“子书素捷，何时可完？”高曰：“申酉间可。”至日，肃属监试王大臣，于五点钟收卷，以工书者必迟，未论则违例，而高必置第一矣。然高卷竟未完，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，概置三甲，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，自分必三甲者，竟提状元，说者以为有天道焉。

此书亦见《翁同龢日记》，传旨某时撤卷，至时发出“寿”字圆形，就所止之处加印，虽只少数字，亦不通融。

按：庚申即咸丰十年。钟雨人名骏声；高心夔二甲十五名，但未入翰林，徐致祥、孙诒经及谭嗣同之父继洵均出于是科。三甲六十六年王庆祺

亦入翰林；斩绝大清朝帝系者即此人。

肃顺之跋扈，不仅此事；其最为人侧目者，为掀起戊午科场案，主考官大学士柏俊竟致斩立决。柏为蒙古正蓝旗人，道光六年进士，奉使朝鲜时，不受馈赠，可知清节。戊午北闱有贿中之事，柏俊亦不过失察，罪不至死；据《清人笔记》所载，不能不说非肃顺所枉杀。

咸丰戊午科场案，为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可相提并论的大狱，虽由肃顺主持，而暗中策划者实为陈孚恩。

陈自文宗即位罢官后，因在江西原籍办团练有功，于咸丰七年复起，初未补缺，后来大概由于同乡高心夔的引介，得肃顺赏识，署理兵部侍郎；八年九月署礼部尚书；未数日，肃顺调礼尚，陈孚恩调兵部，而仍兼礼尚，乃得插手干预北闱。十月初江南道御史孟传金发难，以“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，物议沸腾，请特行覆试”，朱谕“派载垣、端华、全庆、陈孚恩认真查办，不准稍涉回护，并将折内所指各情，传集同考官一并讯办。”

按：柏俊新授大学士，故派两王查办；陈孚恩署礼尚，职司所关，自当参与其事；所可怪者，全庆为兵部尚书，与试务毫无关系，何以亦奉派查办？其中奥妙在陈孚恩亦新调兵部，与全庆同衙门，朝夕相见，便于操纵。

由此可知自陈孚恩于九月初署礼尚开始，即为蓄意掀起大狱的一连串有计划的行动。此案的祸首平龄，为旗下富家子，榜发中式第七名举人；而有人指出，当入闱之时，在某处串戏，是则若无分身法，即根本未曾下场应考。由此推求，审出别样情节，新中式举人罗鸿绎，由兵部主事李鹤龄经手，向同考官浦安买通了关节；而柏俊带入闱中的家人靳祥，则有